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四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〇八期 ——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五日报出）

---

本期目录 （zk0711a）

---

【本刊专稿】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	余汝信
【人物春秋】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姜毅然
【文人际遇】魏建功在“文革”中的遭际	马 嘶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本刊专稿】

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

• 余汝信 •

中发〔66〕281号文件没有标题（这却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惯用的形式），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党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中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该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1966年5月29日发出，地方发到县级以上，军队发至团级以上。

## 一、文件起草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后者的来历，据中发〔66〕267号文件（即“五一六通知”）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记载：“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1〕

这是迄今为止官方关于“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最权威的说法。另据《周恩来年谱》，书记处会议决定，通知由陈伯达起草，起草小组亦以陈伯达为首。〔2〕

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之一的王力，则有这样的回忆：“在北京起草文件（那时还不叫五一六通知）只有几个人，不叫起草小组。四月份在北京写稿后送到杭州毛主席那里。这时毛主席决定开两个会：一个是常委扩大会，在杭州开，参加者有常委、康生、陈伯达，各大区的书记。常委扩大会的任务是批评彭真。另外成立起草小组，在上海，名义上是给常委扩大会准备文件。名单是江青定的，组长陈伯达，成员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穆欣。”〔3〕

以上是王力在1990年代初的回忆。另王力在1980年代初还有以下回忆：“文件初稿送主席后，主席要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名单，并准备在上海召开会议。主席提陈伯达为组长，成员名单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吴冷西、王力、陈亚丁。那时初稿有了，框架子也有了，缺的是主席一次又一次加上的那些重要的内容。这些内容一加，文件的性质也就变了。”〔4〕

文件起草小组的另一位成员穆欣，也有回忆：“经中央审定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名单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刘志坚，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吴冷西、陈亚丁、尹达、张春桥（按：这是当时根据印件过录到笔记本上的）。 ”〔5〕

归纳以上关于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尤其是小组负责人的定夺，共有三种不同说法：一、据《大事记》、《周恩来年谱》及穆欣回忆，是中央书记处（或曰“中央”）决定（或曰审定）的；二、据王力1990年代的说法，名单是江青所定；三、据王力1980年代的说法，名单是毛泽东提的。

王力的说法，前后不一，带有随意性，尤其是“名单是江青定的”一说，总让人觉得不太可靠——当时的江青，尚不至于可以布置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吧？笔者认为，名单是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定的，应还是比较可信的，当然，事前也可能征求过江青的意见，再报呈毛泽东。这样说来，文革发动的前期准备工作，整个中共中央包括了周恩来、邓小平，也是参与了的。

《大事记》接下来并没有明确说明，毛泽东是否批准了文件起草小组的成立，却说及：“四月十六日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这一天，距离4月12日中央书记会议将成立文件起草小组的决定报送毛和常委，仅短短四天时间，即使毛泽东批准过文件起草小组的成立，也必然是仅仅将其视为一个过渡性的安排，毛应该已是成竹在胸，他决意要组织的，已是一个要取代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新的“文化革命

小组”，它比“起草小组”的层次要高得多，权力涵盖面要广得多。

到了5月份，毛泽东的愿望达成。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上文字，为毛泽东亲自所加。（6）

## 二、小组成员简介

中发〔66〕281号文件称：“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及后，代表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分别确定为：郭影秋（华北局）、郑季翘（东北局）、杨植霖（西北局）、刘文珍（西南局），惟中央并未再正式另行通知。

经过四十年历史的沉淀，今天，我们对该小组的成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陈伯达（1904—1989）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共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共。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7年到延安，自1940年代始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为毛泽东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诠释者，亦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推动者。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不低，以1956年八大中央委员得票数为序计，排第11位，文革前夕，在党内排名列第19位。王力说：“陈伯达是个秀才，按毛主席思想起草东西，把毛主席的提法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毛主席一直认为他是可以的，陈伯达有时讲偏了也不要紧，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是听江青的。”（7）其实，说陈伯达在文革中全听江青的，也不尽然。

康生（1898—1975）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山东诸城人。原名张叔平，化名赵容等。1925年加入中共。1926—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1930年代起历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曾负责中央特科，对保卫上海中央机关有特殊贡献。抗战时期领导中共情报系统及肃反工作，打击面过宽而人皆惧之。1945年当选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在华东任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后一度离职休养，1956年八大后重新回到中央，参与领导中共与国际共运关系事务，有中共党内理论权威、国际共运问题专家及“中国的捷尔任斯基”之称，惟在党内威望比陈伯达低，以1956年八大中央委员得票为序计，排第49位，1966年文革前夕党内排名第20位。

关于康生与毛泽东的关系，王力说：“毛主席对他私人关系很好。毛主席说康生历史上有功劳，”“毛主席和康生在诗词、文物、书法方面有共同爱好，有交往。毛主席诗词定稿由康生负责。毛主席和郭沫若打交道的信件也经过康生，编四卷毛选也是康生负责（一、二、三卷是陈伯达负责）。江青是康生的老部下，他是延安社会部的，她的全部材料康生都掌握。”（8）

江青（1915—1991）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副主任。

山东诸城人，与康生同乡。原名李云鹤。1929年春在济南入山东实验剧院，后在上海参加演出进步话剧和电影，艺名蓝苹。1933年加入中共，次年被捕，1937年到延安后重新入党，改名江青。1938年同毛泽东结婚，成为毛的第四任妻子。1947—48年为

中央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随毛泽东转战西北。建国初曾兼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951年参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5—62年病休。1963年后在毛泽东支持下，督促、指导京剧、芭蕾舞剧的“革命”，1965年在上海秘密组织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形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江青自白：“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9〕

王任重（1917—1992）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河北景县人。1933年加入中共。建国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政府副主席，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代市长，武汉军区第一政委。1966年8月继陶铸后任中南局第一书记。

王任重是毛泽东喜欢的地方领导人。爱舞文弄墨，思想也不可谓不左，问题是文革小组中比他更左的大有人在。据称，1966年8月曾授意其女儿王小平与雷蓉等在清华大学写出大字报《三问王光美》等，并为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修改好批判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字报。王力说：“他在钓鱼台不住在文革小组那个楼，他自己单住一个楼，二号楼。他在北京这一段自己搞自己的，还找些红卫兵住在他那里，有清华的、北大的。文革小组的事他不沾边。他是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的文化大革命直接向他汇报，他发指示。后来武汉情况引起毛主席的不满，但他说湖北省委就是好。湖北抓人抓得最早，镇压群众比别地方还厉害。陶铸问题首先从王任重开始。最早毛主席是信任王任重的，毛主席外出经常住湖北，毛主席那里会见外宾等都是找王任重作陪的。”〔10〕

刘志坚（1912—2006）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湖北平江人。1928年参加中共革命，1931年由团转党。长征期间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7年后历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晋冀豫军区第10纵队政委，二野四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军委情报部部长、总政宣传部部长、总政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总政党委副书记。1955年授中将军衔。1966年2月带队参加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参与《纪要》的整理、定稿。

王力说：“刘志坚的夫人是王任重介绍的，他们是老朋友。刘志坚夫妇俩也搬到二号楼。……这个楼以王任重为中心。刘志坚是文革小组副组长，但没起多大作用。刘志坚同王任重被搞到一起，是因为历史上有两条。我不是专案组，我不太清楚，听说刘志坚被日本人俘虏过，营救他的人当中有王任重。王任重被怀疑为特务，刘志坚当然也受到怀疑。再一条是邓小平说过，刘志坚不可重用，他拥护张国焘，这倒没有什么，但是他太过份了，在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里他写的那些东西，组织的漫画，骂毛主席骂得太不象话了。刘志坚是林彪重用的，唐平铸、胡痴都是刘志坚用的人。”〔11〕

张春桥（1917—2005）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山东巨野人。1938年加入中共。同年到延安，曾任《晋察冀日报》、《石门日报》主编。

建国后历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艺工作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张春桥自1958年即进入毛泽东的视线。当年10月11日，毛亲自为《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写了编者按语，称：“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目。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12〕毛同年还多次指派张春桥与陈伯达等到各地调查人民公社问题。

张春桥代表上海市委，对江青在上海进行的文艺革命方面的活动，尤其是1965年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曾给予过全力支持，承担了政治风险，这使他与江青的关系变得非比寻常。

谢镗忠（1918—1989）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江西赣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共。曾历任四野48军142师政委、解放军第48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海南军区兼第43军副政委，第二政委，海南军区第二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授少将军衔。1964年调任总政群工部部长，1965年7月转任总政文化部部长。1966年2月曾随刘志坚到上海参加江青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尹达（1906—1983）《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委员。

河南滑县人。原名刘耀。1932年河南大学国学系毕业，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参加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工作。1937年在兄赵毅敏（原名刘焜）影响下到延安，1938年加入中共。建国后协助郭沫若筹办中科院历史所，1954年创办并主编《历史研究》，兼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所长，1955年起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赵毅敏建国后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兄弟俩均为毛泽东所赏识。

1966年2月27日出版的《红旗》1966年第3期，刊登了尹达据称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的《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内称：“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指导下，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的历史。”毛泽东同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多次提及尹达：“尹达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写得好。尹达是历史所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老的，学问多的，”“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13〕

王力（1921—1996）《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联部副部长。

江苏淮安人。原名王光宾。1939年加入中共。建国前在山东从事党务工作，建国后历任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中联部副秘书长，《红旗》杂志编委。1963年7月起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4年7月起为中联部副部长。王力自己说：毛泽东曾说过，用文字表达毛泽东思想最好的是王力。在1960年代中共国际“反修”斗争中，参与起草了包括“九评”在内的多篇论战文章，为中共对外关系的主要笔杆子和实际参与者。文革期间，为中共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文革序幕阶段，为文革文件起草小组主要成员，与陈伯达一起起草了“五一六通知”初稿。文革期间为中共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他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理论的最初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也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和第三个里程碑”的主要提出者，王力的这些提法，均得到毛泽东的认同。

关锋（1919—2005）《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山东兴云人。原名周玉峰。1933年加入中共后，长期在山东解放区从事文教工作。1956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主编《思想界动态》，1958年调新创办的《红旗》杂志任编委，主要从事理论方面，尤其是中国哲学史方面的研究。1966年5月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关锋在文革前发表过三百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述，又以何明、东方明、庆云、古棣及撒仁兴（与吴传启、林聿时）等笔名发表过不少杂文和哲学史论文。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指责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称：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指的主要就是中宣部扣押关锋、戚本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及后，4月5日出版的《红旗》1966年第5期，即发表了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文。

戚本禹（1931—）《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山东威海人。1948年加入中共。1950年入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1956年后称中办政治秘书室），为毛泽东秘书班子成员，协助田家英校编《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后任政治秘书室科长。1963年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在史学界引起震动及争论，毛泽东褒扬其文：“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1964年夏在陈伯达要求下到《红旗》杂志负责历史组工作，得毛同意但令其今后随传随到，仍可随时出入中南海。1966年4月组成文革文件起草小组时为成员，5月调回中央办公厅，是年夏天挂名为中办秘书局副局长。

1965年12月6日出版的《红旗》1965年第13期刊登了戚本禹的《为革命研究历史》，对翦伯赞为代表的史学观点进行了不点名批判。毛泽东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14）1966年3—4月间，戚本禹连续发表了多篇批判文章，即与林杰、阎长贵合写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单独署名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及《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穆欣（1920—）《光明日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

河南扶沟人。原名杜蓬莱。1937年加入中共。1946年后历任新华社二野四兵团分社社长，志愿军三兵团宣传部部长兼新华分社社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1957年反右后被派至名义上仍由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实际由中宣部和中央统战部领导的《光明日报》任副总编辑（总编辑陈此生），由穆主持实际工作，以保持中共的领导。《光明日报》1960年代是毛泽东爱看的报纸之一，1966年3月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这就是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15）

3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穆欣的《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6月，穆欣任《光明日报》总编辑。7月1日出版的《红旗》1966年第9期发表了穆欣的《“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以批判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穆欣在文革结束后作文，从不提及自己这段历史。

姚文元（1931—2005）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浙江诸暨人。父姚蓬子为文名不佳的前1930年代左翼文人。1948年加入中共。1950年后在上海卢湾区团工委、区委宣传部工作，1957年任《解放》半月刊编辑部文教组组长，上海市作协党组成员。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毒草，该文以后被认为是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称：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6〕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次日，全国报刊转载了这篇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

郭影秋（1909—1985）改组后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文革办公室主任。

江苏铜山人。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1936年加入中共。建国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云南省省长，1957年主动请求辞去省长职务到高等院校工作，同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转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校长吴玉章）。郭影秋到新市委任职后，仍兼人大职务。

郑季翘（1912—1984）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

山西五台人。清华大学肄业。1935年加入左联，1937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晋冀冀中央局研究室主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红旗》杂志常务编委。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17〕指的就是郑季翘。郑的《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定稿于1966年1月，发表于1966年4月5日出版的《红旗》1966年第5期，文章称：“现代形象思维论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

杨植霖（1911—1992）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内蒙古土默特旗汉人。1930年由团转党。历任中共绥远省委常委，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处书记，华北局委员。1961年发表《王若飞在狱中》，次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刘文珍（1911—1982）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院长。

山西霍州人。1937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宣传部副部长、秘书长，中共绵阳地委书记，四川省委常委。

以上17人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人，中央候补委员1人，担负理论宣传领导工作的省级或相当于省级负责人5人，担负解放军宣传文化领导工作的军队负责人2人，从副部级直至处级的左派“学者型”干部6人，另加一位特殊人物——江青。年龄最大的是康生，68岁；

最小的是戚本禹、姚文元，同为35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文革初期都是积极的，有过不等的“功绩”。

### 三、“第二书记处”

所谓“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的，是一个什么实体？将起什么作用？大概除了毛泽东本人，谁也说不明白。江青翌年4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一个比较低调的说法：“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18〕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秘书班子”？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江青两天后也从上海抵京，毛泽东回京后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有关工作组的材料，对文革进展情况大为不满。24日，毛召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会上，毛对派工作组提出批评，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并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5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文革小组成员，再次严厉批评工作组搞了很多乱，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19〕毛泽东在24日的讲话中赞扬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事，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20〕

毛泽东要求各大区书记和文革小组成员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7月25日、26日连续两晚，文革小组成员到北大，参加全校师生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25日晚，康生在讲话时称：“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来看你们，向你们问好。我们受毛主席的委托向你们问候。现在我介绍一下来的几位同志：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同志、刘志坚同志、张春桥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曹轶欧同志。”26日晚，江青在讲话中称：“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来了。我们的组长陈伯达同志，我们的顾问康生同志，副组长王任重同志，刘志坚同志，副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王力、关锋、姚文元、穆欣、戚本禹、郑季翘，还有三个组员没有来，他们有工作。”〔21〕

这大概是文革小组成员在群众中集体亮相的首次记录。

7月27日晚，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时称：“今天我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所有成员都到北师大来，跟着你们学习文化革命的经验。……好多同志写条子来，要我们介绍文革小组的同志，我执行这一指示：组长陈伯达同志，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副组长、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同志，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同志，成员：《红旗》副总编辑王力同志，中宣部副部长张平化同志，《红旗》副总编辑、常写文章的关锋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大家都知道的姚文元同志，在报纸上常看见的戚本禹同志，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同志，《光明日报》总编辑、《红旗》副总编辑穆欣同志，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同志，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同志，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郑季翘同志。还有一位副组长因为有事情，今天没有来，王任重同志。（江青：这位是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康生同志）。”〔22〕

康生的讲话有四处值得注意：一，在介绍江青时，首次将江青称为“第一副组长”。虽然中发〔66〕281号文件并没有这样的提法，但“第一副组长”的称呼却不胫而走，甚至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亦然；二，在介绍张春桥时称其为华东局书记，据中共官方资料实为华东局委员；三，在介绍穆欣时除《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外，还介绍其为《红旗》副总编辑，惟穆欣此一



职务未见于正式文件；四，介绍张平化时，将他列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关于张平化，据官方资料，1966年6月中旬，张率文化革命工作队进驻中宣部，此前，他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6月17日，中央决定张平化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虽然从未有研究者见过张平化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正式文件，但值得重视的是，有关张是小组成员的说法不止康生讲话这一处。8月5日，李雪峰在清华大学讲话时，也将在场的张平化介绍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23）此外，中共官方2000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数据》亦称：“……此后被确定为小组成员的有张平化、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并将张列入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中。（24）从该书编纂者的阵容以及权威性方面考虑，以上说法，想来应该有所依据。

7月29日，李雪峰在新市委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新调来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人大副校长郭影秋也犯了错误，决定撤销他的市委书记职务，回人民大学去作检查。”（25）

郭影秋犯了什么错误？李雪峰没有说。毛泽东在9月7日一个批语中说及郭：“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它都没有，……”，（26）看来，有农民去保郭，也就是郭的一个主要问题。同样被令回原单位接受批判的，同一时期还有曾被毛称赞过的尹达，不知为什么这时毛没有保他。而陈伯达7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对中科院全体工作人员讲话中则指责尹达道：“他辜负了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他的希望，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活动是不正常的，是暧昧的。他不能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能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划清界限，变成了保皇派。上周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讲过尹达同志在《红旗》工作后又调到中央文革小组。我是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能当保皇派的保皇派。”尹达、郭影秋是小组成员中最早靠边站的两位。此外，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7月间曾在京参加过小组的一些活动，及后也就各自打道回府，再未与中央文革小组有何瓜葛。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8月2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陶铸（1908—1969）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

湖南祁阳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年加入中共。陶铸历史上曾是林彪的部属。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东北，历任辽宁、辽西、辽吉、辽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与林彪关系相当不错。建国后历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代理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起兼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1960年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2月免兼），1965年1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中宣部部长，以取代原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

陶铸作风硬朗，在1950年代广东土改和反地方主义中以偏左的方式大刀阔斧打开局面，虽引致广东地方干部的不满，却很得毛泽东赏识。以毛1967年1月的说法，陶铸到中央是邓小平推荐，但当时应还是得到毛在内的中央常委一致接纳的。

8月8日，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了些套话、客气话：“昨天，主席要我和同志们见面，认识一下。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同志们经过紧张的劳动，你们的工作碰到了困难，有很大的困难。运动开始蓬蓬

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要起更大的作用。当然泼冷水泼下去了，靠毛主席扭转过来了。不然大山压下来顶不住，大石头挡住通不过。”（27）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8月14日，中央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了政治局常委，补选了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陈伯达、康生三人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同时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其中陶铸由一普通中央委员突然跃升为党内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堪称奇迹。

8月12日全会通过的公报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列席了会议。公报将小组成员的位置，放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同志”的后面，中央各有关部门“同志”的前面。

有论者断言，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有意扶持它以实质上取代中央书记处，此说并非全无依据，而且，这还可能就是毛泽东“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的本意，就象他以余秋里的小计委实际取代了李富春的国家计委一样。

从表面上看，中央书记处当时还存在（就象组成了小计委，大计委还是存在一样），不仅存在，还得以充实，八届十一中全会不仅批准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叶剑英分别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的决定，还补选了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使书记处成员达至13人之多。（28）惟存在与否是一回事，毛泽东喜欢不喜欢它，眼中有没有它又是另一回事。

10月24日，毛泽东指责道：“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到南京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当月，毛泽东还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插话：这个人很懒）。”“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29）

中央书记处、国家计委与北京市委一样，都是毛泽东眼中的“独立王国”。

我们知道，江青所说的“秘书班子”，与“书记处”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Secretariat*。即使在中文里，“秘书”与“书记”的性质也没有什么两样。故而，我们与其说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毋宁说它是“第二书记处”、“小书记处”更切合实情，因为当时两者是同时存在的，起码在1966年内是如此，只不过在毛泽东那里，两者显然亲疏有别。

#### 四、“第一副组长”

自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到《座谈会纪要》，江青从幕后走出前台，崭露头角。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江青有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被全党所“认识”。1966年下半年，江青的位置不断往前移，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党和国家主要负责人”之一。

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和百万群众。新华社电讯称，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并以“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接见了他们”一句突出了江青。到会的文革小组其它成员的名字，则排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成员、军队负责人的后面，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的前面。（30）

8月26日，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宣布，唐平铸、胡痴、谢富治、汪东兴、周荣鑫、曹轶欧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31）

8月30日，中共中央通知：陈伯达因病休息，在陈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职务。（32）

陈伯达后来回忆称：“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不久，我生病发高烧，住进医院。我提出可由江青代理组长，中央同意。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我正在医院，江青代表小组致辞。从此江青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的话就没人听了。

“记得有一天，王力到医院来，他叫我不管事了，说宣传方面的事现在陶铸同志管，小组的事现在江青管，我再发表意见不好，让我安心养病就行了。后来陆续有一些同志来医院看我，我提出一些事情和看法，结果就触怒江青了。我的病还没有好，江青就让关锋叫我出院。

“我开始晓得江青很难对付。过去我和她直接的接触很少，对她缺乏了解。一段时间，我和周总理都说过她的好话，这是出于照顾她和毛主席的关系，另一方面，认识她需要有个过程，她自己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33）

8月31日，毛泽东以乘敞篷汽车绕行天安门广场后再开大会的方式，第二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据新华社消息，毛和林彪“以及贺龙同志”，由谢富治、杨成武陪同乘第一辆汽车，紧跟着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辆汽车，邓小平、康生、刘少奇、陈毅乘坐的第三辆汽车，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乘坐的第四辆汽车，叶剑英、萧华、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乘坐的第五辆汽车，缓缓绕行天安门广场一周，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六时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宣布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开始。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问好。她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34）

如陈伯达所述，他没有出席这一天的大会。新华社电讯首次公开称江青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10月1日，新华社在报道国庆17周年庆祝大会时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党和国家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萧华、杨成武、江青等，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江青首次被官方通讯社列为“党和国家的主要负责人”，虽然，她是这个名单中的最后一人。（35）

江青的政治地位，在1966年结束之前便已得以巩固。11月28日晚，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名“革命文艺战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之所以隆重其事，是为了对江青进行一次集中的人为拔高和吹捧，这是一次向江青表忠献媚的大会。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等中央政治局成员出席了大会，新华社的电讯特别突出了周恩来、陈伯达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江青，三人在大会作了“重要讲话”。（36）

江青的讲话，分别于11月24日，27日两次送交毛泽东审阅，毛细心地作了多处修改，并称：“改了一点，供小组同志们参考。”“又有点修改，似较妥当些，”关爱之情，跃然纸上。（37）

谢镗忠在大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他

说，这是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我军文化工作的极大关怀。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很好，领会得很深，运用得很活，很坚决。由她担任我军文化工作顾问，是加强部队文化工作革命化、战斗化的重要决定。”

划归解放军建制的北京京剧一团等文艺团体的谭元寿、郁蕾娣等先后在会上发言。新华社引述他们的话说，江青同志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与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领导我们进行了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艺术的大革命，使这些艺术走上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成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有力工具，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有力工具。

关于江青，陈伯达只讲了一句：“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38〕

而周恩来则是长篇大论：“在这里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的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直接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39〕

周恩来的讲话，通篇充满了卑躬屈节、谄媚奉承的表白。谁又可以说，在江青迈向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没有周恩来推波助澜的一份功劳？

（2007年10月）

注释：

〔1〕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附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66年5月19日发出。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27。

〔3〕《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页585。

〔4〕同〔3〕书，页932。

〔5〕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和平图书？新天出版社，1997），页76。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40。

〔7〕〔8〕同〔3〕书，页712—713。

〔9〕〔18〕《江青同志讲话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页29。

〔10〕〔11〕同〔3〕书，页718—720。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447。

〔13〕〔15〕〔17〕毛泽东这两篇讲话在文革中流传甚广。本文抄录自文革群众组织出版物《东方红1956—1967》（编者佚名）及笔者自己文革中的笔记。

〔14〕〔16〕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67号附件二，页4—5。

〔19〕同〔2〕书，页40—42。文革中流传毛这次讲话的日期为7月21日。

〔20〕《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编者佚名，1969年7月），页777。

〔21〕《首长讲话选编（1966年6月至10月）》（联合编辑组，1967年3月）页6—

8。原文将曹轶欧误为“曹玉娥”。曹轶欧为康生夫人，据王广宇：《关于中央文革建立下属机构的回忆》一文，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于1966年7月初，康生当时宣布办公室主任由穆欣担任，戚本禹、曹轶欧任副主任。穆欣的回忆录则称三人负责办公室，穆欣为召集人。

〔22〕《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一集（编者佚名，1966年10月），页28。

〔2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数据〈1〉》（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联合汇编，1966），页8—16。

〔24〕〔31〕〔32〕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数据》第六卷“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页61—62。

〔25〕同〔23〕书，页7—39。

〔26〕同〔6〕书，页124。

〔27〕《林彪文选》（编者佚名，1967年11月，武汉），页242。

〔28〕书记处书记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康生、陶铸（常务书记）、叶剑英、谢富治、刘宁一，候补书记刘澜涛、胡乔木。

〔29〕同〔13〕书，页329—332。

〔30〕《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第一、二版。

〔33〕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页305—306。

〔34〕《人民日报》1966年8月31日，第一版。

〔35〕《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日，第一版。

〔36〕〔38〕《红旗》杂志1966年第15期（12月13日出版），页5—13。

〔37〕同〔12〕书，页163—166。

〔39〕《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四集（首都大专院校赴西南革命造反派编，中国京剧院红色革命人民战斗队翻印，1966年12月），页60。

~~~~~

## 【人物春秋】

### 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 姜毅然 •

梁漱溟（1893—1988），广西桂林人，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和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因为1953年与毛泽东公开“争论”而为人熟知，他对建国后一个时期内开展的阶级斗争并不完全赞同，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期开展的“批孔运动”更是明确表示反对。

#### ◇ “四人帮”发起“批林批孔”运动

1970年，中央决定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以使国家政治生活走上正轨。但在1970年夏季召开的筹备四届人大的庐山会议上，林彪集团却搞突然袭击，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用毛泽东当时的话说就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粉碎了林彪集团的阴谋。1971年9月，林彪策划暗杀毛泽东的阴谋败露，乘三叉戟飞机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

在调查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时，工作人员在林彪所住的北京毛家湾1号的卧室里，查到了许多林彪亲笔写的条幅，其中有许多孔子说的话。“四人帮”便借题发挥，说林彪的思想和孔子一脉相承，是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决定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继续批林彪

的极“右”，把矛头指向老干部。在他们的建议下，毛泽东也同意搞“批林批孔”。于是，在“四人帮”的鼓噪下，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 ◇ 梁漱溟因发表不同观点引人注目

在林彪事件没有发生之前的1970年，全国政协在组织讨论国家《宪法》草案时，梁漱溟就对在《宪法》中写上林彪是接班人的条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任何国家的宪法，都不能把谁是接班人写上，这不符合国家宪法的精神。梁漱溟当时提出这样的意见时，受到了批判，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后来四届人大会议没开成，讨论国家《宪法》草案自然也流产了。

林彪事件发生后，梁漱溟当时所提的意见，被许多人认为是有先见之明的。梁漱溟本人倒不这么看，他认为自己只是经过认真思考后，按照国家宪法的精神提出的。但不管怎么说，他当时能够提出这个意见，总不能算错误的。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梁漱溟就因以前提出过反对林彪的意见而引人注目。

另外一个原因，是梁漱溟对孔子和儒学素有研究，“四人帮”及其亲信一直把他看作是现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因此，他们把眼睛紧紧盯住梁漱溟，想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整一整他。“批林批孔”运动是1973年10月在全国展开的。当时，已经恢复“学习”权利的在京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也被组织起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为了组织好政协委员们参加运动，还成立了全国政协“临时学习领导小组”，领导政协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领导小组要求，全国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人士都必须参加学习。学习期间，除了学习上边指定的中央文件以及报纸上的社论、文章外，还要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在学习中，参加者都不得不表态“拥护”“批林批孔”运动，违心地说自己受到了孔子学说的毒害，狠批“孔老二”，然后硬把孔孟之道和林彪的罪行联系在一起。

梁漱溟却与众不同，他在“批林批孔”学习会上不发言、不表态，因此在参加学习的政协委员和知名人士中特别引人注目。“四人帮”的亲信发现了梁漱溟的态度与众不同，就自然地把他在所在的学习小组——政协直属组，当成重点组，要针对梁漱溟开展一场斗争。

他们把梁漱溟所在的政协直属组当作重点，自然有他们的道理。第一，梁漱溟是对孔子和儒家哲学素有研究的著名学者，用当时的话说，是一位老牌的“一贯尊孔”派。第二，梁漱溟在任何学习会上都独立思考，说出的话也与众不同，从不随波逐流。

一开始，梁漱溟在学习会上不发言时，他们做了两种估计：一种是梁先生也随大流，表态支持“批孔”，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梁先生从一个老“尊孔”派变为新“批孔”派，他们就可以大做宣传了；另一种是梁先生反对“批孔”，如果他那样做，他们就把梁漱溟当作“反面教材”，来个“批林批孔又批梁”。他们预想：第一种的可能性很小，第二种的可能性非常大。实际上，他们就等着抓住梁漱溟的把柄。

当时，参加政协学习会的许多人也十分希望能听到梁漱溟与众不同的声音。因为他们“批孔”确实是违心的，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表态支持“批林批孔”是不行的，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都说同样的话，已经腻味了，对于读文件、读社论和文章，对于“四人帮”那种强加于人、无限上纲的做法，大家内心十分反感。他们自己不敢公开唱反调，却特别希望梁漱溟这个敢于直言的人唱点反调，说一点与“四人帮”的亲信们不同的话。于是，大家便心照不宣地把眼光投放到梁漱溟身上，但愿他能一如既往地直言，说一说他们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 ◇ “四人帮”的亲信逼梁漱溟开口

梁漱溟似乎看出了不同的人的不同心情，但他就是不讲话，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四人帮”当时十分注意政协的学习情况，他们在听汇报时，得知梁漱溟不讲话，便猜出他心中有不同意见。而“四人帮”的亲信们为了邀功，开始主动挑衅，逼迫梁漱溟开口讲话。

一天，全国政协学习小组正在学习，外面传来消息说，首都体育馆开了一个大会，动员“批林批孔”，江青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她在动员“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也批判了梁漱溟，并说了这样的话：“梁漱溟何许人也。”

江青此言一出，手下人立即紧紧跟上，没过几天工夫，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就有人贴大字报，攻击梁漱溟。后来，又有上边传下来的江青讲话的录音带。这个录音带中，江青确实攻击了梁漱溟。于是，参加全国政协学习组的人对梁漱溟的下一步举动就更加注意了。

梁漱溟显然知道了这一情况，但他假装不知道，还是不讲话，一直保持沉默，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梁漱溟为什么保持沉默？事过多年之后，他说出了其中原委。他说：“那时候，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其实另有所图，她点了我的名，我脑子被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是咋回事。我只是认真地读报、听文件，感到都是同一个声调，同一个‘立论’——那就是对孔子百分之百的否定，并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我对此不能苟同，心里一直在否定。但我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既然弄不清来龙去脉，还是静观为好。不料想保持沉默也不行，非逼得我开口不可，尔后引出了好一番周折。”

其实，梁漱溟一言不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亲属、朋友们劝他不要发言，也不要发表文章，以免引火烧身。梁漱溟为了不让亲属和朋友为自己操心，答应了他们。

但是，“四人帮”不允许梁漱溟保持这种态度，他们非要逼迫他讲话。当时，梁漱溟所在小组的20多个人都发言了，都表态拥护“批林批孔”，只有梁漱溟依旧保持沉默。但是，他们也不敢直接逼梁漱溟发言，因为在政协学习会上，发言是自由的，可以表态，也可以不发言，不好硬逼。但他们可以在会议上“动员”，这时便有人在“动员”时，不点名地对梁漱溟发出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感情问题、立场问题。”尽管这样“动员”，还上纲上线地说梁漱溟不发言就是立场问题、是感情问题，但梁漱溟仍然不发言。

这时，有人使出了激将法，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哲学系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

此人的激将法果然有一点效果，梁漱溟听他这样讲后，直摇头，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见着他呢，我怀疑文章所说的是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

梁漱溟的话音刚落，有人马上反击，声色俱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梁漱溟只是笑了一笑，没有再说什么。

这次会后，梁漱溟提笔给北大某教授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作为一位有信誉的学者，长期从事儒家学说研究，不应该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可能是因为梁漱溟的这封信也被“四人帮”手下的人知道了，从此对梁先生的追逼就更紧了。

在他们的催逼之下，梁漱溟只好搞一个简单表态。这个表态，确实是唱了“四人帮”的反调。

#### ◇ 催逼之下梁漱溟简单表态

上次学习会上有人直接“警告”梁漱溟后，他仍然不打算与他们形成正面冲突。经过认真思考后，他写了一个简单的便条，决定在会上念一念，算是自己的表态。1973年12月14日的学习会上，梁漱溟把自己写好的便条带在身上，学习会开始后，好多人发言完毕，小组召集人把目光盯在梁漱溟身上，催促他也“谈一谈”。这时，梁漱溟才从容地拿出那张事先写好的便条，当场念道：

“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的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协和、协调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毛主席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文章不发表、不公开，我无奈答应了他们。眼下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梁漱溟的这个发言虽然简短，虽然是念便条上的字，但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出他反对“批林批孔”运动，特别是“批孔”。

梁漱溟的意见已经明确了，对会场所有的人是一个不小的震动。在这种大的政治运动中，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他竟然敢于公开提出反对“批林批孔”，好心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而处心积虑要抓梁漱溟把柄的人则暗自得意，觉得这下可抓到把柄了，可以开始批梁了。因此，梁的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抓住他说的“我准备专门写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发表”的话引诱他：“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怕什么？”

梁漱溟一生光明正大，一贯反对搞阴谋诡计，此时有人反倒给他扣上了“阴谋诡计”的帽子，这对梁漱溟是个极大的侮辱，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但他忍了下来，努力坚持不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他退了一步，说：“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但是，主持会议的人却穷追不舍，非要逼梁漱溟发言，紧逼一步说：“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

话讲到这个份上，梁漱溟已经没有退路了。既然非要他讲出自己的观点，不讲就是搞阴谋诡计，讲得长了也愿意奉陪，那么梁漱溟只好答应做准备，下一次会上讲。

#### ◇ 梁漱溟发言反对“批孔”

这次学习会后，梁漱溟回去认真地做了准备，他把自己自从“批林批孔”开始以来的思考进行了系统整理，写出了一个长篇发言稿。

下一个学习会，是在1974年2月22日开的。这次来参加会议的人很齐，大体是为了



听一听梁漱溟到底讲什么，而“四人帮”的亲信们也十分重视这次会议，专门安排人作记录。

会议开始时，他们便以十分严肃的气氛来对待这次会议，但梁漱溟却显得很轻松。这一天，他穿得很整洁，人也很有精神，带着一个大皮包，里面装着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参考书、笔记本。

会议开始，他就站起来表示自己要发言，主持者立即同意。梁漱溟很从容地先从皮包里把讲稿、参考书、笔记本一件件取出，摆在会议室的茶几上。那年梁漱溟已经81岁了，虽然他身体很好，但毕竟是个老人了，出于客气，会议主持者请他坐下讲。梁先生有礼貌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就站着讲。

他仿佛像从前在北京大学课堂里讲佛学一样，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他讲话逻辑性很强，一环扣一环，在场的人鸦雀无声地听着，连咳嗽的声音都很少，许多人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着。

梁漱溟的发言，主题是疾呼孔子有功有过，不可全盘否定。这次学习会上，梁漱溟一个人就讲了半天，还没有讲完就到中午了，会议不得不暂时中止。由于梁先生没有讲完，主持者不得不说等下次学习会上让梁先生接着讲。

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上作长篇发言反对批孔，半天没讲完的消息，立即在全国政协传开了。其他学习组的人知道了，全国政协机关知道了，不久全北京文化界许多人都知道了。听了全国政协的汇报，上边自然也知道了。但当时各方面还来不及作出反应，也就没有阻止梁先生下一次发言。

2月25日，政协继续开学习会，主持者照上次说的，让梁漱溟继续讲。梁先生接着上次的发言，又讲了一个半天。这两个半天，梁先生讲的话，内容很丰富，但集中于如何评价孔子，共有数万字。后来，会议安排的记录者汪东林先生将其内容整理了出来，并且公开发表了一些重要内容。

梁漱溟在长篇发言中，还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旁征博引，颇为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没有经历过典型的奴隶制度的问题。梁的结论是：中国没有经历过像欧洲古罗马、古希腊那样的典型的奴隶制社会，中国从原始社会以后一开始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初具封建宗法制度的社会，中国有为数有限的家奴而没有成群专事生产的奴隶；西周是封建社会，殷商也是封建社会，只是其完善的程度不同而已。梁漱溟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他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应当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说到此，梁漱溟的话锋一转：

“如今批判‘克己复礼’一词最时行，殊不知许多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克己’且不说了，单说这‘复礼’之‘礼’吧。既然中国并没有典型的奴隶社会，那么这‘礼’又怎能是指奴隶主之‘礼’呢？至于林彪写‘克己复礼’这张条幅，据说还在卧室挂了起来，究竟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己’和‘礼’又何所指？我看除了问他自己，别人难以解释。”

#### ◇ 梁漱溟遭到批判却心态平静

在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竟然讲出这样一通话，自然避免不了挨批。果然，在梁漱溟发言之后不久，全国政协就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先是在全国政协出现了一些大字报，公开指责梁漱溟，后来又出现一些大标语，有的大标语很是扎眼：

“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

“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

在政协学习会议上，这些大标语也作为一些人的口号喊了出来，政协学习会转而展开了以批梁为主的学习阶段。在批判中，许多人讲不出多少道理，就来了个“老账新账一起算”，把梁漱溟搞乡村建设的事情提了出来，把搞和平建国的事提了出来，把1953年与毛泽东争论的事情提了出来，就是没有人提他在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反对把林彪接班人地位写进《宪法》一事。

对于“老账新账一起算”，梁漱溟早有了思想准备，对于许多人批判他的发言，他坦然对待。他知道，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是有组织的，既然如此，难免有人安排大家在会上做表态性发言，然后推举代表，到大会去做批判发言，一时间，是搞得十分热闹的。因此，梁漱溟十分沉静，他只把自己当作观众，在台下一坐，听着别人批判他的发言，就好像听着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一样。会议休息时，梁漱溟走出会场，到外面一小片空地上打起太极拳。他的这种沉稳心态，使许多人暗中敬佩。

倒是被安排的发言者，显得十分忙乱。他们按照上边的要求写好发言稿后，上台违心地宣读，这是十分难受的，因此大家从心里不愿意去接这个差事。在后来的一系列批判会上，有些民主党派学习组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愿意上台读批判梁漱溟的发言，最后只得由上边裁决，指定某人为发言人。

梁漱溟始终保持一种沉稳的姿态，使会议主持者也难为情了，于是他们又组织人对梁漱溟进行具体追问，最让追问者自鸣得意的是：“你反对‘批林批孔’，你是不是反对批林彪？”本来，“四人帮”是把“批林批孔”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梁漱溟不能作出合情合理的解答，他们就会给梁漱溟扣上一个反对批判林彪的政治大帽子。

既然逼到这个份上，梁漱溟也就不能不回答了。他回答说：“林彪没有路线，他是一个鬼，没有人格，够不上做一个人！”

梁漱溟接着说：“‘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讲出来怕与诸位不合拍，会产生新的麻烦，能暂容我不说更妥、更好。”

梁漱溟本来是想作出简单解释之后，也就不再讲下去了。但他既然亮明自己关于“只批林，不批孔”的观点，并且提出自己的“批林”与众不同，那么就避免不了被人穷追下去。于是，有人就紧紧追问道：“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就全部讲出来，不把话全部讲出来，是过不了关的。”这样，迫使梁漱溟不得不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了。

梁漱溟说：“我的观点，一是林彪没有路线，批林就是批他不是人，是个鬼！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为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

尽管梁漱溟把自己的道理讲得入情入理，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竟然敢于这样公开反对“批林批孔”，就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了，在全国像梁漱溟这样公开反对一个大政治运动的人，恐怕是极少极少的。因此，“四人帮”抓住梁漱溟，对他展开批判就不奇怪了。梁漱溟的发言和他后来解释的许多话，被他们断章取义，拿来任意发挥，上纲上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

还不断升级，开始时还限于梁漱溟所在的20多人的政协直属学习组，后来便上升为一两百人参加的联组批判会，以加大“批林批孔又批梁”的作战威力。

◇ 梁漱溟说：“匹夫不可夺志！”

梁漱溟本人并不想把这种批判持续下去。他知道，自己的发言实际上是逼迫的产物，可也确实是自己想要说的话，但他仍然迫切希望能尽快结束这场对自己的批判。他当然是不怕批判的，这是他的品格。但是，他不希望这件事扩大，以至于影响大局，也不希望与勉强上台作批判的发言者伤了和气。出于这种想法，在批判展开之后不久，他便主动检查自己的初衷和效果问题。

1974年3月8日，梁漱溟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负责记录的汪东林记下了梁漱溟下面这些话：“最近我大胆狂妄地放言高论起来，我原说文章写出后亦不公开拿出来。‘仍不公开’的话说了多次，就是怕公开出来不合适。第一怕文章内容上的学术分析研究，远离了当前的政治运动，文不切题；第二怕有碍于当前的政治运动，没料到不拿出来的东西，竟然拿出来其中一部分，很有碍的一部分，自己违背了初心，忘记了自己的政治任务。这错误不怪自己怪谁？又犯了老毛病，个人英雄主义，好胜、逞强。错误是我的错误，罪过是我的罪过，一切我应担当。”“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仁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委员说，不要再称我什么‘梁老’？‘梁先生’了，真是快人快语，痛快人说痛快话。有声有色，会上的气氛才像个样儿，所以上次临散会，他话没讲完，主持会议的于老（树德）说下次接着讲，我也站起来应声说‘下次再讲吧！’我心里此时没有我，只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和任务，可惜我不能经常这样无我——如果我那样高明，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错误了。”

1974年3月11日，梁漱溟又在学习会上检查自己说：“我的长篇发言远离了当前‘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有碍于当前群众的‘批孔’，错误是严重的。本学习组同仁对我的一切斗争都是理所当然，我不应再诉说什么。再说话，便是错上加错，我只有静听的义务了。”

但是，梁漱溟对于自己的观点是决不改变的，是坚持到底的。这样，尽管他一再检查自己发言的初衷、态度、个人英雄主义、逞强等，但他只要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说假话，想结束这场批判，也是不可能的。结果，他越解释，别人抓他的把柄就越多，批判会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新内容，有人还特别抓住他对待“批林批孔”运动的态度问题。

面对“四人帮”亲信始终抓住不放，面对他们的穷追不舍，梁漱溟知道自己怎么检查也没有用了，他横下一条心，不再说话了。从1974年3月中旬以后，他就不说话了，但他坚持每会必到，洗耳恭听。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批判会开了几十次。只是在众人一再追问他对待批判林彪的态度时，他才断断续续地讲了前边摘录的汪东林先生整理并发表的那些话。

批判梁漱溟，他却不说话，这使得批判者们也感到没有什么意思，加上天气太热，大家也厌倦了开大会。于是，到1974年9月下旬，大家就结束了联组批判会，又回到各自的小组去。在结束联组批判？回到小组的第一天会议上，主持人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他有什么感想，梁先生并不回答，主持人一而再地问。不料，梁先生竟脱口说出下面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显然激怒了会议主持人和一些积极分子。主持者问：“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梁先生朗声解释道：“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

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就是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在说这段话时，小组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在认真地听。梁先生说完这些话后，半晌无人说话，也许人们都在思考梁先生话中的真意，也许大家也在反思自己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言行。只有少数几个人站起来嚷道：“梁漱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但这些话毫无力量，也没有多少人应和。

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的发言无疑每次都报告给了上边，但上边一直没有什么处理意见。就在结束联组会议转为小组会议几天后，上边传下话来说：梁漱溟不可改悔，不必和他纠缠，不要“转移了大方向”。随着这句话的传来，对梁漱溟的批判也就收场了。

□ 《文史春秋》2007年第9期

~~~~~

## 【文人际遇】

### 魏建功在“文革”中的遭际

• 马 嘶 •

#### ◇ 交代与“认罪”

1966年的春天，燕园就不很平静了。这种不宁静的氛围，除了北大“四清”运动留下的一些后遗症引发出来的一些人事纠纷之外，最为直接的原因便是由讨论《海瑞罢官》和有关“清官”问题的争论。特别是3月25日戚本禹发表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以后，一股愈来愈浓烈的火药气味就在燕园里蔓延开来了。此时，北大校园里响着揭发、批判翦伯赞的“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史学观点”的杀伐声，而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点名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文章之后，北大校园里所引起的反响和震荡就更大了。

5月14日，以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为组长的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7人来北大“调查”。5月中旬，曹轶欧调查组在住地友谊宾馆与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见面，谈有关“文化大革命”问题。5月25日，聂元梓、宋一秀、夏剑彖、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7人签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这张大字报引起了全校的激烈争论和思想混乱。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出后，全校震惊。从此，文化大革命在北大、北京、全国大规模展开。

此后，北大成为“文革”中两派政治势力激烈斗争的中心地带，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不断来到这里，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亲自在这里发号施令，指挥作战。

7月27日，聂元梓按照江青的授意，向全校提出“民主选举校文革筹委会”的倡议，次日，“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主持开会，聂元梓任主任委员。

8月17日，毛泽东题写“新北大”三字。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大师生代表。

8月19日，聂元梓召集发起成立北大“红卫兵”组织大会，建立了校红卫兵联络站。

8月30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9月11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聂元梓为主任。

聂元梓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红卫兵在校内外进行了大量的“横扫四旧”，抄家没收家产、文物、书籍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校内被抄家的有536户，教授53%、中层干部80%以上均被抄家，外籍教师也有被抄家的。

“文革”开始后，魏建功就理所当然地被列为“黑帮”、“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无休止地进行批斗，让他“交代”和“认罪”。

1966年10月28日，校“文革”办公室发出“加强对黑帮管理”的通知，将被他们划定的“黑帮分子”先后集中到朝阳区南磨房、昌平区太平庄统一监督劳动。

在北大，魏建功自然算不上被重点批斗、应该“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的人物，况且，他平日很是受到师生们的尊敬，大家对他没有什么恶感，且平素又有“跟党走”的绰号，可见他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充其量不过是个“反动学术权威”。因而，在运动初期，他只是“靠边站”，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揪了出来，被集中起来学习、交代问题，而他逐渐引起红卫兵们注意，开始无休止地交代、认罪，那是由于一些历史旧案。有人发现：魏建功原来是被鲁迅骂过的人，这自然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自然要让他交代是怎样的反鲁迅的？以后，又有人知道，他曾同陈独秀有过许多交往，抗战期间他帮助陈独秀整理、抄录过《小学识字教本》等著述，那么，他与陈独秀究竟是什么关系？于是，魏建功自然就成了一个交代问题的重点人物了。

最引起人们怀疑、一定要他交代清楚的是他的“反对鲁迅”的问题。

一些人在《鲁迅全集》的《集外集拾遗》中看到了鲁迅的那篇《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和[备考]中的魏建功的《不敢盲从！》等几篇文字，便断定魏建功是反对鲁迅的，是鲁迅的论敌，这犹如发现了新大陆，这一发现甚至被某些人当作一次“大胜利”。于是，这便有了批斗魏建功的“内容”。

魏建功与陈独秀的关系，是被一些人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的。因为在解放后所见到的中共党史书籍中，陈独秀是作为“托陈取消派”的头子而被否定的人物，而“文革”开始以后，一提起建党的事，似乎就只有毛泽东，以及晚了许多年才出现的林彪，即使是被北洋军阀杀害的李大钊烈士也很少提及，陈独秀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红卫兵让魏建功交代与陈独秀的关系，他们是企图挖出他与托派的关系，而实际上，魏建功与陈独秀完全是师生之间讨论学术问题的关系，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一点政治上的问题。而那几年中，陈独秀也只是闭门著述，不再过问政治。这样，造反派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对魏建功的怀疑，也就自生自灭了。

开始，魏建功还只是每天到“学习班”交代问题，晚上回家去住，到了1968年7月，他就被集中到“监改大院”住宿，接受“劳动改造”，每月只发40元生活费，直到12月才解脱劳动，回到自己家中居住，此时，已算是“解放”了，工资也照常发了。

这期间，魏建功的主要事情就是一遍又一遍地交代问题，按照专案组提出的要求，一遍又一遍地写交代材料。或者，接待外来的外调人员，接受人家的询问，写“交代材料”，客气一些的，便让他写“证明材料”。这些事，便成了他每天的主课。魏建功是个很认真的人，每写一份材料，他都是搜索枯肠地回忆往事，那些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旧事，有的记得真切，有的已经遗忘了。但他总是要认真地去写、去想，尽量做到不遗漏了什么。每写一份，他又总是用复写纸复写一份，把原稿交上去，复写的一份自己留起来，以备查阅。天长日久，他竟写了厚厚的几大摞。而这些完整或不完整、长的或短的材料，他一份也没有丢掉，统统留了下来。当然他当时没有想到，他写的这些“交代材料”、“证明材料”，其实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些珍贵资料。

#### ◇ 修订《新华字典》

魏建功被解脱走出“监改大院”后，很快就参加了工作，此时，他已届古稀之年了。他参加的是修订《新华字典》的工作。“文革”开始后，正常的出版工作遭遇到了严重的冲击，就连《新华字典》这样一本普及性的小字典也无法出了。

到了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务院科教组组织一个班子修订《新华字典》，“以应中小学生和工农兵的急需”。这一年的9月，科教组便以北京大学的中文、历史、哲学、经济、图书馆各系为主力，吸收中国科学院、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参加，组成了一个50多人的《新华字典》修订小组。北大参加这项工作的教师有魏建功、游国恩、袁家骅、岑麒祥、周祖谟、周一良、阴法鲁、曹先擢、陆俭明、孙锡信、安平秋等多人。上级指定由北大的魏建功、安平秋、曹先擢，商务印书馆的阮敬英，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曹乃木和工、军宣传队各一人，组成了七人领导小组，由曹先擢任组长。王力也提供了一些材料。

魏建功是《新华字典》的始作俑者，他当然也就更为认真负责地参与这项工作。1971年6月，《新华字典》（修订版重排本）出版发行，魏建功等人又转入修订《汉语成语小辞典》的工作。

1972年5月29日和5月30日，魏建功还就词典编纂问题两次写信给他的学生曹先擢，第一封信长达数千言，详尽地谈了他对编纂词典的12条意见。这充分表现出他对编纂词典的热忱和真知灼见。他在5月31日付邮时又在信函上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廿九日晚带了词表和两封信去中关村找您，天黑了，门牌号数不知道，就在沟西的东南地区兜了一个圈子又回来了。今天想，先请邮务员送给您，把词表抽下。

专业里工作并不重而有时性，所以挤掉和您交换意见的工夫。现在学习任务又来了，最近个把星期不能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十号以后欢迎您来我处悬谈一次！

1972.5.31付邮 建功

一个71岁的老人，在朦胧夜色中奔波寻觅的身影跃然纸上。对工作、对事业，他是多么热忱和认真！

#### ◇ 受命充当“梁效”顾问

“文革”期间，北京大学的政治斗争经过多次较量，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政治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聂元梓被揪出，一批老干部、老教授被解放，开始担任一些行政职务。周培源成为革委会副主任，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北大开始抓教学活动，一些系科恢复招生（工农兵学员），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也开始招生。

根据1973年3月北大革委会人事组的统计，老教师担任系革委会领导职务的有：周一良任历史系革委会主任，魏建功任中文系革委会副主任，陈岱孙任经济系革委会副主任，段学复任数学系革委会主任，褚圣麟任物理系革委会副主任，等等。他们虽然没有掌握实权，但已表明他们是已经被“解放”、可以出来工作的、可以被“结合”进去的人物了。虽然如此，但对于一直过着“交代”与“认罪”生活的魏建功来说，心中实有些感激不尽了。

1972年，魏建功被北大派遣参加中央委托北京市委召开的批判林彪罪证座谈会，1973年6月，他又被派参加中央委托北京市委召开的第二次批判林彪罪证座谈会。

1973年12月18日，迟群从北大、清华抽调18人，成立了“大批判组”。迟群布置他们提前围绕《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写一批文章，准备在《材料》之一公布时，配合发表。1974年1月13日，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工字厅召开清华、北大两校批林批孔小组、大批判组及动态组三个组的全体成员会议，会上宣布：毛主席已同意批准两校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将发行全国。会上提出了继续编写材料之二、之三、之四的任务，并决定三个组统一领导，由北大党委常委李家宽为总负责人。1月26日，北大、清华两校党委常委联席会议决定，将两校批林批孔研究小组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并扩大队伍；两校大批判组的活动地点在北大朗润园北招待所。大批判组实际由迟群控制、领导。大批判组的财政开支，由北京市财政单列。两校大批判组在报上发表文章时署名“梁效”。

魏建功被调去两校大批判组任顾问，分工查找孔孟原话并作注释。同时调去的还有冯友兰、周一良、林庚等。他们的工作就是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之二做注释。1974年5月，“材料”编成后，又接着做“法家著作”注释稿，整理《三字经》故事，编《幼学琼林》出版说明，圈选《古文观止》等零碎的工作。

关于魏建功等几位老教授在两校大批判组时的工作情况，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一书中是这样写的：

梁效设支部书记一人，由迟群、谢静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担任；副书记二人，北大清华各出一名。三十几名成员中，两校之外，还有少数人民大学的教师。成员除老教授晚间回家外，都集中食宿，每天三段时间都须到班。梁效纪律森严，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集中驻地在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门禁森严，给外人以神秘莫测之感。梁效主要任务是写作，由中青年同志担任，为“四人帮”制造反动舆论。写作意图由迟、谢两人下达，或由《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口头传达，有时甚至写书面提纲交给各写作小组。几个写作组之外，还有个研究组，后改名为注释组，几名老教授在内。江青听毛主席谈话，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不懂的典故，立即通过迟、谢两人命令这个组查阅报告，起了顾问咨询的作用。梁效还要求老教授对于写作组的文章在文献典故方面发挥所谓“把关”的作用。记得在1976年批邓公开化之前，支部书记布置写了一篇《再论孔丘其人》，矛头所指已极为明显。支部书记意犹未尽，最后又加问一句：“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呢？”我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这是记忆中在梁效所起的惟一次“把关”作用……注释组的任务是对指定的诗词或文章简明注解或译成白话，据说是供护士读给毛主席听时之用。注释组成员认为这项任务直接为毛主席服务，都兢兢业业，尽心竭力去从事这个工作。

江青曾几次来驻地与梁效成员见面，她去天津、小靳庄和山西大寨，也令梁效成员以外的某些教授随行。江青谈话浅薄无知，而喜欢自吹自擂，炫耀卖弄。她给我的印象并不佳，但她

口口声声主席如何，因而给人感觉她是主席的代言人……梁效后期注释工作，有时任务急如星火，又须大家讨论定稿，每每深夜才能回家。我常常一边蹬自行车一边想，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

……记述孔子生活的，主要为《论语·乡党》一篇。因此，江青命令把《乡党》篇译成白话，供广大群众批判。这个任务当然落实到注释组。篇中讲到孔子在朝廷上的姿态，有一句“趋进，翼如也”，描写他向前急走的神情。几个人反复推敲捉摸，想不出恰当译法。魏建功老教授灵机一动，说“翼如也”指的是孔丘张开两臂，形如鸟之双翼。但直译“如鸟张翅”不太雅驯，不如说“端着两个胳膊向前急走”，更为传神。魏老说着站了起来，端起双臂，躬身向前快走了几步。大家连忙一致赞成他的说法，就这样定了稿……

周一良写的这些情况，魏建功也是同样经历过的，而且文中还提到了魏建功在注释组时的一件事，更可看出魏建功那时的思想和工作状况。

但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梁效”成员成了现行反革命，魏建功等这几位参加注释工作的老教授也便成了审查的对象。在回忆了魏建功在译“翼如也”时“灵机一动”之事后，周一良写道：

谁知“四人帮”倒台后，大量批判“梁效”影射史学的文章中，有人提出“端着两个胳膊”是影射周总理，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因为总理右臂受过伤，总是弯曲像端着（据说是在延安时，江青骑的马惊了，把总理从马上撞下受伤）。虽然总理只是端着右边一只胳膊，但批判文章对“梁效”欲加之罪，自然也就顾不得那些了。魏老当然多次被审讯，异常紧张。注释组的每个成员也都被提问，大家一致承认这句译文出自魏老，但都表示，他决无借此攻击总理之意。退一万步说，总理也不是端着“两个胳膊”呀！

政治审查自冬徂春，又经历了第二个冬春，迟迟未宣告结束，更谈不到处理结论。人们猜想此案大约经过多人，都感到棘手，在“四人帮”定案之前，无人敢负责宣布结束审查。北大党委对每个成员都很了解，也无能为力……

“梁效”接受的最大规模的批斗会，是在首都体育馆批判斗争迟群、谢静宜大会上陪斗……大会为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一位来注释组不久的中国文学老教授成为从宽发落的典型，而一位写文章的主要笔杆子则从严发落，未经法庭审判，关进监狱达一年之久。“梁效”的审查到1978年秋间结束，又过了几年，我被告知不给任何党政处分，也不入档案。

然而，为了这件事，年已七十五六岁高龄的魏建功又是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经历了多少惊吓与悒郁！

□ 摘自《一代宗师魏建功》，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2月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



